



主编：袁志刚 顾云深 陈皓

走向国际化的

金融创新与管理变革

ZOU XIANG GUO JI HUA DE  
JIN RONG CHUANG XIN  
YU  
GUAN LI BIAN GE

国际化环境中的管理议题  
金融创新与资本市场  
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博士后经济管理论坛

# 走向国际化的 金融创新与管理变革

主 编 袁志刚 顾云深 陈 皓

副主编 顾美娟 尹 晨

专家名单（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飞翔 戴国强 华 民 姜波克

芮明杰 寿伟光 王方华 薛求知

袁志刚 张光平 朱道立 左学金

復旦大學 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国际化的金融创新与管理变革/袁志刚,顾云深,陈皓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9  
ISBN 7-309-04754-0

I. 走… II. ①袁…②顾… III. 金融体制 - 经济体制改革 - 中国 - 文集 IV. F8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09176号

## 走向国际化的金融创新与管理变革

袁志刚 顾云深 陈皓 主编

---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

责任编辑 王联合 鲍雯妍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

印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9.5 插页 2
字数	550千
版次	2005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 500

---

书号	ISBN 7 - 309 - 04754 - 0/F · 1061
定价	48.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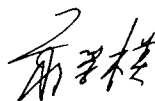
# 序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都发生了令世人瞩目的变化。跨入新世纪后,中国发展的主题进一步从追求温饱转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多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引进和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东西,博士后制度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例。从1985年至今,中国的博士后制度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从城乡二元结构到信息化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等,这些既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逐步升级,又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题转换和实践探索。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进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作为主要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青年学者,博士后群体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金融创新、资本市场、管理变革等方面,在理论上和实务上都进行了敏锐和富有洞察力的探索,做出了有益和富有成效的贡献。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关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建议、关于中国公司治理的讨论、关于中国跨国企业发展模式的探讨、关于企业管理方面的前沿思考等,或体现了理论思考的创新,或反映了实务操作的建议,这些都表明中国的博士后群体在涉及中国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上,已经并继续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

值此中国博士后制度建立20周年和复旦大学100年校庆之际,复旦大学承办上海市博士后经济理论论坛,这既是对博士后制度20周年的纪念,也是对复旦大学这所百年学府的祝贺。本书收录的论文是经专家评审选出的,反映了上海市博士后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两个学科门类的部分研究成果。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会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和新的主题,也将为理论探索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博士后们应当可以做出更多的贡献。

祝愿年轻的博士后研究者们脚踏实地、继往开来,更上一层楼!



二〇〇五年

# 目 录

## 第一篇 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

### “东南亚模式”与“东亚 NIEs 模式”的比较

- “成长的共享”的启示 ..... 陈 云( 3 )
- 全球化时代经济正义的实质及其困境 ..... 何建华( 23 )
- 农村义务教育资金投入管理决策前瞻性缺失思考 ..... 侯德贤( 34 )
- 保护建筑遗产 构建和谐社会 ..... 黄 松( 43 )
- 经济发展、劳工标准与社会和谐 ..... 李春林( 54 )
- ### 结构增长模型
- 一个非均衡的动态多部门模型 ..... 李 武( 66 )
- 政府转型、就业促进与和谐社会 ..... 刘社建( 80 )
- 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城市就业的动态均衡 ..... 罗守贵( 91 )
- 资本等级制内生决定假设下的中国 FDI 依存结构研究 ..... 钱 勇( 97 )
- ### 农村土地对农民多重效用及地区差异性研究
- 以甘肃、湖北、江苏和上海为例 ..... 王克强 刘红梅(110)
- 政府主导、产品差异化与云南旅游奇迹 ..... 翁 瑾(120)
- ### 关注弱势群体 构建和谐社会
- 以上海市长宁区弱势群体研究为例 ..... 曾芬钰(138)
- 投资回报率、工资增长率与中国养老体系的基金制改革 ..... 曾令波(149)

“开发区软实力”:概念及其系统分析研究…… 朱晨海 彭正龙 孙国华(162)

## 第二篇 金融创新与资本市场

- 中国上市公司反倾销调查中的盈余管理研究 …………… 黄新建(177)
- 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经济后果的实证研究 …………… 李 丹 崔慕华(189)
- 银行贷款损失税收待遇制度研究 …………… 李文宏(201)
- 地方政府竞争对中国资本形成格局演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 刘大志(214)
- 创业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刘志阳(224)
- 渠道约束、工具属性与收益评估:中国股市个人投资者参与  
影响因素分析 …………… 卢 华(234)
- 论国际银行业监管新秩序  
——新巴塞尔协议之探究 …………… 牛晓健(248)
-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产业经济影响的定量分析 …………… 孙 林(260)
- 粤港经济整合中的金融合作与制度创新 …………… 孙茂辉(274)
- 西部地区中小企业融资能力实证分析 …………… 吴文旭 赵洪江(284)
- 做市交易策略及做市商悖论 …………… 余书炜(298)
- 银行存差:一个基于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解释 …………… 张 红(311)

## 第三篇 国际化环境中的管理议题

- 融资因素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分析 …………… 郭丽虹(327)
- 外国金融控股公司经营组织结构分析及借鉴 …………… 郝晓彤(338)

---

不同证券运动形式下操纵行为的选择 .....	汪贵浦 陈伟忠(348)
作为动态学习过程的跨国并购研究 .....	胡 峰(359)
对资源观战略理论的一个简要评述 .....	孔德洋(368)
贷款人对企业信息收集、分析与判断研究 .....	李红霞(378)
走向全球的企业发展和管理创新	
——对跨国企业理论的思考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考察 .....	李建华(389)
经济人、企业公民与我国国企改革新视角 .....	李 振(399)
产业链的知识整合及其制度需求 .....	刘明宇(410)
产业集群应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深圳产业集群的实证分析 .....	杨树旺(419)
快速物流通道布局规划方式方法研究 .....	杨 涛(426)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选择与决策	
——基于实物期权理论的分析 .....	赵 明(432)
社保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问题研究 .....	张万成(443)
上海期货交易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简介 .....	(453)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简介 .....	(45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简介 .....	(459)
上药集团科研工作站简介 .....	(461)
编后记 .....	(463)

# 第一篇

## 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





# “东南亚模式”<sup>[1]</sup>与“东亚 NIEs 模式”<sup>[2]</sup>的比较

## ——“成长的共享”的启示

陈 云

### 一、序言：问题的提起

战后东亚<sup>[3]</sup>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在民族国家的整合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开始经济建设的。权威主义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发展经济,不断提高国民的福祉水平——以最终完成民族国家的整合。“国民国家的统合”是指在民族国家范畴内,生活圈、文化圈、社区网络充分发达的状态。它需要经济发展作为基础和保障。

本文把东亚地区的权威主义开发模式分为“东亚 NIEs 模式”、“东南亚模式”和“中国模式”。为什么韩国、中国台湾等能成功实现经济现代化和体制民主化演进?东南亚(以及南亚)国家却困难重重?其实,东南亚、南亚国家政局动荡的背后,都和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困境息息相关。

“东南亚模式”的问题在于:“产值工业化”和“人口工业化”呈现严重的不整合性。产值工业化本身成了目的,人的现代化被忽视了,由此造成贫富差距加大,农村的绝对贫困,以及城市中的贫民窟现象触目惊心,再加上民族和宗教纷争,以及社会、政治体制中的不整合性,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相比之下,“东亚 NIEs 模式”更好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内生性人口增长模式),成就了“成长的共享”这一“大同理想”。

本文本着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关切,主要围绕“成长的共享”这一关键词对“东亚 NIEs 模式”和“东南亚模式”进行比较,希望对“中国模式”有若干启示性意义。

## 二、“东南亚模式”的特点

### 1. 东南亚国家(地区)工业化水平的进展

东南亚国家(地区)普遍采取进口替代战略来实现工业化目标。从政策评价来说,进口替代战略有积极的一面,即20世纪60年代以后,亚洲国家(地区)的工业化率(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明显上升(表1)。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菲律宾的工业化率从1960年的20%上升为1975年的27%,以后保持水平推移状态;泰国更加明显,从1960年的11%稳步上升为1985年的21%左右;马来西亚从1960年的9%上升为1985年的18%。

总体来说,在1960—1986年,亚洲各国(地区)的制造业占GDP的比率急剧提高。亚洲NIEs为21%—39%,ASEAN(除印尼)各国为18%—25%;而当时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约为23%(随着“经济软性化”进展,发达国家服务业的比重逐渐提高)。

表1 亚洲国家(地区)制造业占GDP的比率

单位:%

	农业		工业		其中:制造业		服务业	
	1960	1986	1960	1986	1960	1986	1960	1986
印尼	54	26	14	32	8	14	32	42
菲律宾	26	26	28	32	20	25	46	42
泰国	40	17	19	30	13	21	41	53
马来西亚	36	23	18	30	9	18	46	47
新加坡	4	1	18	37	12	27	78	62
韩国	37	12	20	42	14	30	43	45
中国台湾	28	7	29	47	22	39	43	46
中国香港	4	0	39	29	26	21	57	71
日本	13	3	45	41	34	30	42	56
美国	4	2	38	31	29	20	58	67
发达国家	6	3	40	35	30	23	54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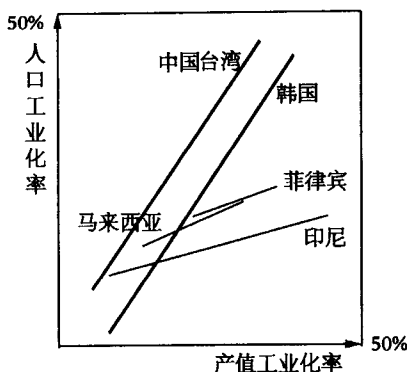
注:工业包括: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电力、自来水、煤气。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New York;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Taipei.

### 2. 成长而不能“共享”的指标化:“产值工业化”和“人口工业化”的严重不整合性

但是,东南亚国家(地区)的问题也非常明显,即“产值工业化”和“人口工业化”指标的严重不整合性问题。

图 1 是东南亚模式与 NIEs 模式比较的概念图,显示了 20 世纪 60—80 年代,亚洲国家在产值面和就业面的工业化率的推移。横轴表示生产面的工业化率,在这一指标上,东南亚国家(地区)与 NIEs 国家(地区)几乎在同等水平上进步;纵轴表示劳动力的工业化率(工业部门雇佣劳动数占总就业数的比率),这方面东南亚国家(地区)的比率大大低于 NIEs 的比率。



资料来源:根据 World Bank, World Tables, Third Edition, Vol. I, II, New York., 绘制。

图 1 1960—1980 年亚洲各国(地区)的产值工业化率和人口工业化率发展趋势比较

### 三、“东南亚模式陷阱”的表现及其原因剖析

那么,东南亚各国(地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存在以下原因:(1)外生性人口增长率居高不下;(2)东南亚国家(地区)的“三农”问题:包括对属于技术性革命的“绿色革命”的评价以及农村土地改革的失败;(3)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的问题:对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和贸易战略以及城市贫民窟问题的评价。下文将对此着重分析。

#### 1. 外生性、爆发性人口增长问题

“人口增长率居高不下”的现象和东南亚、南亚各国的殖民地历史有关。西欧的殖民者在 16 世纪以后陆续来到东南亚、南亚,而到了 18 世纪的殖民地时代,殖民者已经直接染指殖民地具体的经营管理。由此,西欧的近代医疗体系由外部被植入东南亚、南亚,这些国家的人口死亡率大大降低,人口迅速增长。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由于这种高人口增长率是外生性的结果——即不是由于自身社会经济等的进步“内生性”地自然生成的,而是外来因素植入后“硬性生

成”的结果,因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模式(死亡率低下的原因)有所不同。

(1) 发达国家:内生性人口增长模式。

在西欧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一般是农业革命先行,然后进入工业化阶段。在日本,这两者几乎同时发生。由于产业革命提高了工业生产能力和人们的收入也随之提高。在饮食质量改善、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医疗设备扩大、医疗制度的扩充、卫生保健思想的普及以及流通手段的发达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死亡率不断下降。表2记录了发达国家历史上经历的人口增加的最高值一般为0.4%(法国,1830—1860年)至1.4%(荷兰1890—1920年)左右<sup>[4]</sup>。

(2) 发展中国家:外生性人口增长模式。

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在进入殖民地时代后,由于西欧式近代行政制度和法律秩序等的建立,种族纷争大大减少(殖民主义者是现状维持者),如此,战争对人口的消耗减少,降低了这些国家的死亡率;同时,交通运输和通讯网络建设,使得地方的饥荒救援变得相对容易,这也使人口死亡率下降——相应地,人口增长率上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国家纷纷独立,各国都进行了“公共卫生革命”,即大规模导入防疫、医疗体系,典型的例子如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利用直升机向蚊虫孳生的湿地大量播撒 DDT,使得该国的疟疾几乎全灭(疟疾曾经是该国最大的死亡原因)。由此,该国的死亡率由1940年的4%降低到了1947年的1.4%、1954年的1%,1972年进一步降低到0.8%。结果,斯里兰卡的人口增长率相应从20世纪40年代初的1.7%上升为1947年的2.5%、1954年的2.7%。有研究表明,1946—1960年斯里兰卡死亡率的降低,有42%是DDT的功劳。

其他热带传染病(如黄热病、天花、霍乱等)也由于杀虫剂、抗生素、疫苗等的低价购入或无偿援助,以及政府公众医疗保健制度的普及而大大缓解。

结果是亚洲国家的婴幼儿死亡率大大降低,人口增长率异常迅速,基本相当于发达国家历史最高值的两倍左右。

同时,从动态的角度来观察英国、日本、印度的人口长期变动趋势,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特点:①亚洲人口增长要快得多;②死亡率降低的速度按英国、日本、印度的顺序呈现加速降低的趋向。<sup>[5]</sup>

我们知道,人口与经济之间存在某种微妙的关系。事实上,东南亚、南亚国家也意识到了太快的人口增长速度对经济的影响。在亚洲,最早实施计划生育的国家正是人口大国印度。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迪拉·甘地政府决定通过实施强制节育手术等计划生育政策来缓解人口问题,但是在实施中遭遇反对党和民众的抵抗,掀起了轩然大波。该政策被指责违反人权,1977年3月,英迪拉·甘地首相被迫下台。结果在亚洲,印度的出生率的下降速度最慢。

这次人口政策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挑战了印度的习俗和宗教信仰,为此英迪拉·甘地付出了重大的政治代价。在制度层面的民主体制已经得到确立的印度,理性的反对党的不在场反而使这一“民主制度”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

## 2. 东南亚国家的“三农”问题

20 世纪 60—70 年代中期,战后新兴的民族国家纷纷在国际社会的配合下进行了“绿色革命”。但是从结果看,由于人口的外生性、爆发性增长,大量过剩的人口消耗了“绿色革命”的成果,农村依然贫困;同时,由于土地改革的失败,“绿色革命”以后的农村的不平等性甚至还在不断扩大。农业现代化困难重重,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制造了严重的城市贫民窟现象,这是农村的贫困在城市张开的“饥饿的大口”。

### (1) “绿色革命”带来了什么?

由于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遭遇“耕地极限 + 人口膨胀 → 农业停滞”的困境,通过生物技术革命来解决粮食危机的想法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目标。“绿色革命”的主角是国际和各国国内的研究机构以及各国政府;主要方法是开发新型高产水稻、小麦良种,并推广其种植面积;推广对象除了人多地少的东南亚、南亚国家外,还包括墨西哥、哥伦比亚等美洲国家。事实上,韩国等也利用这一契机开发适合本国的良种,参与了这场“绿色革命”。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前半期,东南亚的传统水稻品种的单产只有日本的 1/3,这种传统稻种的特点是:如果对其多施肥,则枝叶会过分繁茂,细弱的稻秆在抽穗期会出现倒伏。为了开发对化肥具有良好感应性的新品种(HYV),洛克菲勒、福特两财团在菲律宾大学成立了“国际稻米研究所”(IRRI),60 年代后期开发良种成功,其特点是短秆、不倒伏,单产也有很大提高。这些稻种经过继续改良,在亚洲的水稻地区引入。到 70 年代中后期已经有相当的普及率(表 2)。

表 2 高产稻种在亚洲的导入面积比率的推移

单位:%

国名	1967 年	1970 年	1973 年	1976 年	1979 年
孟加拉国	0.002	2.6	11.1	15.0	11.9*
印度	2.5	11.3	22.3	32.3	43.8
印度尼西亚	-	10.4	24.4	31.0	41.0**
菲律宾	2.7	43.5	54.0	64.2	70.0*

注: \* 1978 年, \*\* 1977 年。

资料来源: A. C. Palacpac, World Rice Statistics, Manila,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1980.

从效果上来说,“绿色革命”带来了以下成果:

①单产(土地生产性)增加。表3显示了1968—1985年亚洲各国稻米单产的变化。粮食丰收使得粮价下降,缓解了各国的粮食饥荒,也大大缓解了通货膨胀压力。

表3 亚洲各国稻米单产指数变化(1968年=100)

国名	1968年	1970年	1973年	1976年	1979年
孟加拉国	100	97	106	116	124
印度	100	104	115	124	142
印度尼西亚	100	111	123	154	186
菲律宾	100	129	129	167	199

资料来源:FAO, *Production Yearbook*, Rome.

②劳动雇佣量增加。“绿色革命”后诞生的高产良种相对于传统品种的雇佣吸收率倍率。各国都有10%—44%的增长率。其原因在于,良种撒播下去以后,需要大量劳动力作田间配套劳动,如除草等(精耕细作的需要);另外,良种的生长期短,一年多熟,这样就可以增加总的劳动雇佣量;再有,良种对化肥的感应度高,化肥、农药、水的需求加大,这样就带动了关联产业的就业需求量<sup>[6]</sup>。

③农业工资(农民收入)并没有增加。由于人口增加迅速、剩余劳动力难以消化,从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农业工资并没有明显增加,其中人口问题最严重的孟加拉国在1970—1975年农业工资呈现下降趋势,1975—1982年虽然略有上升,但随后再度下降<sup>[7]</sup>。也就是说,尽管“绿色革命”取得了一定成功,但由于人口问题(外生性人口增长)严重,绿色革命的成果迅速增长的人口所消耗;同时,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一场没有触及制度革命的技术革命并不能彻底解决农民和农村的贫困问题。东南亚国家的“土地改革”失败是一大教训。我们来看一组比较数据:在台湾的土改中,允许地主保留的土地面积与农户平均占有的耕地面积的比值是3,这一比值在印度是13.9(1950—1961年),埃及是16.39(1961年),菲律宾是20.89(1963年),巴基斯坦甚至高达102<sup>[8]</sup>。显然,仅从这几个国家如此高的比值就可断定,他们的土改根本不能触动传统地主阶级和土地制度。

④最后,还必须注意到“绿色革命”的若干副作用,如大量施用化肥、农药造成土地肥力下降、环境污染。另外,土地制度改革滞后(见下文),使得“绿色革命”的成果分配不均衡,在结果上甚至扩大了原来的不平等度。这是因为:在土地、资金、外汇、市场、税收、公共服务等方面,大土地所有者均比小农占优势,因此他们获得的好处最多。

(2) “成长而不能共享”的弊病在农村的表现:绝对贫困。

人口的快速增加,再加上耕地扩张迎来极限,结果就是耕地的细分化程度加剧。表4显示了东南亚、南亚国家农业的一些相关指数。孟加拉国和印度的耕地基本没有增加;印尼和菲律宾有少量的增加。另一方面,各国的农业人口均增加了20%左右(印尼除外)。这样两者相权衡的结果,使得耕地/人口比指数在各国都呈现较大的降幅(印尼除外)。

表4 亚洲国家农业的相关指数(农地/人口比)

国名	耕地面积指数		农业人口指数		耕地面积/农业人口指数	
	1980年	1984年	1980年	1984年	1980年	1984年
孟加拉国	100	100	110	120	91	83
印度	100	100	109	119	92	84
印尼	100	106	103	104	97	102
菲律宾	100	115	111	120	100	96

资料来源:FAO, Production Yearbook, Rome.

耕地的细分化造成的不利后果是农民层的下方分解加剧,即“自耕农→小农→雇农+农业劳动者(无地农民)增加→农民收入降低(厚生福利水平下降)”的连锁反应。

当然,耕地的细分化也有可能带来有利的刺激因素,即通过技术进步(品种改良、肥料投入)和“绿色革命”来节约耕地,进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这方面的刺激作用也确实发生了,但是如上所述,技术性的“绿色革命”并没有根本性地解决东南亚的“三农”问题。

与此同时,东南亚、南亚国家农村的绝对贫困的程度确实在加深。以南亚国家孟加拉国为例。该国农村户均占有的耕地面积2英亩以下的小农和无地农民的累积户数,1960年为37%,1968年为48%,1974年为61%,1977年达到65%,呈现逐年递增趋势<sup>[9]</sup>。从农户的粮食自给率来看,“绿色革命”发生后的1973—1974年,孟加拉国粮食自给率不满3个月的农户占了总农户数的63%,粮食自给率为4—6个月的占14%,7—9个月的占9%,10—12个月的占10%,有粮食剩余的农户仅占4%<sup>[10]</sup>。

因此,孟加拉国农户中的绝对贫困家庭<sup>[11]</sup>逐年增加。1967年绝对贫困家庭比率为42%,1974年为44%,1976年为64%,1977年达到60%<sup>[12]</sup>。结果,孟加拉国的农户出卖土地、进而出卖劳动力的“农民层下方分解”成为必然伴生的现象。根据孟加拉国政府“1977年土地保有情况调查”,无地的雇农家庭已经占了全农户的33%。这些家庭在农忙期帮他人耕地、整地、插秧、除草、



售货、脱谷；在农闲期则从事小生意、中间商、木工、拉车、女佣等零活、杂活。

不仅在南亚，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多。菊池真夫研究了时间序列上菲律宾某一村落无地雇农家庭的生成情况。1939年，原有的独立农户11户中，11户全部有自己的耕地（自耕农），迁入农户2户中有1户是自耕农，1户是雇农；到了1970—1976年，19户独立农户中有13户沦为了无地雇农。在迁入农户中这一比率更高，17户中有14户是无地雇农<sup>[13]</sup>。

雇农的大量生成对农业工资造成了“降价”压力。在菲律宾有调查表明：日平均工资1960年为14比索，1977年下降为10.1比索。收入的不平等化程度也进一步提高了。劳伦兹曲线表明，菲律宾最贫困的40%的农户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随时间的推移逐步降低。具体说来，1957年占18%，1965年占15%，1975年降低为12%<sup>[14]</sup>。另外，绝对贫困农户的大量产生令人担忧。根据《菲律宾发展调查报告》显示，在贫困线（以粮食等基本生存维持指标计算）之下的农户数的比率，1965年为75%，1975年上升为85%。

### 3. 城市化、工业化中的问题

#### （1）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和贸易战略的影响。

东南亚采取的进口替代战略的具体做法是：市场内向型（国内市场）；部件、中间产品、机械设备等从发达国家进口。其配套政策包括有利于此的高汇率、低进口关税等，目的是鼓励国内企业对原本需要进口的产品进行替代性生产，并保护其独享国内市场。因此，进口替代是一种内向型工业化战略。

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起步阶段不但缺乏生产工作机床等生产资料的技术能力，尤其缺乏本土优秀企业家，因此进口替代往往通过当地企业（其中有不少华人企业）和外资企业（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创办合资企业的方式来展开。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动力则来源于：①绕开发展中国家严格的进口限制政策；②适合亚洲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政策，利用优惠政策设立企业，获取非竞争性的市场和利益。

亚洲发展中国家竞相对外国投资采取各种优惠政策，迎来了外国直接投资的高潮。例如，菲律宾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以国内财阀与美国企业创办的合资企业为核心进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泰国在60年代中期经历了该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业化阶段；越南战争的“特需”刺激了经济，外资大量流入（从19世纪中叶起，泰国就曾是一个对美国的初级产品依存国）；马来西亚也在60年代以后，以纤维、电机产业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进口替代工业化运动。

典型的进口替代工业是汽车产业（汽车的生产、组装）。发展中国家的汽车产业实际上是跨国公司的“分支工厂”，资本和技术均来自外部。